

辞书学论文集

赵振铎 著



商務印書館

辞书学论文集

赵振铎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辞书学论文集/赵振铎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ISBN 7-100-04589-4

I. 辞... II. 赵... III. 汉语—辞书学—文集
IV. H1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735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CÍSHŪXUÉ LÙNWÉNJÍ

辞书学论文集

赵振铎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4589-4/H·1147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1 7/8

定价: 20.00 元

前　　言

这是我自选的一个以辞书学为主的论文集。

从小就和辞书打交道，小学生时代老师要我们每个学生都要有本《学生字典》，随时翻阅，养成查字典的习惯。直到大学字典没有离开过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因为在中文系教书，更少不了要用字典。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会去编字典。

1975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字词典编辑出版工作座谈会”，决定要编一批字典和词典，解决国家严重词典荒的局面。这次会议的决议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下达。那就是“国发（1975）137号文件”。文件确定湖北和四川两省承担《汉语大字典》的编纂任务。川大中文系自然是编字典的首选，我很愿意去编字典，因为当时的“评法批儒”、“评《水浒》”等我实在不感兴趣，但是又跑不脱，能够去编字典，可以躲开这些运动。我去出版社找到有关同志，谈了我的想法，他们正为组建班子发愁，听到我自愿来编字典，当然满意，答应帮我去争取。有人笑我说：编字典是个苦差事，吃力不讨好，有些人躲都来不及，你还去“自投罗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有自己的打算，这样我就可以不被叫去讲什么“评法批儒”、“评《水浒》”，讲那些令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跳出那个“大批判”的圈子，作点实实在在的工作，能够和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专长，应该说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竟被定为四川省领导小组的成员，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原来只想当一个一般的编写人员，现在不可能了。湖北方面负责字典编纂业务工作的是李格非教授，他和我是老朋友，北大一齐进修，苏联又在一起讲学，和他合作，有事好商量，应该是愉快的。这次我们共同工作了十六年，把字典编成。

记得在开始编写工作的时候，我和格非曾经交换意见：高等学校的教师去编字典，应该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要把编写工作和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要研究字典编纂工作存在的问题，总结理论来指导编写实践。为此我留心编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并且随时和格非商量，向各个编写组的同仁请教。工作中我作了不少笔记，在《辞书研究》、《词典研究丛刊》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多数是针对当时编写工作里面发现的问题而写的。

在字典上马之初，大家讨论得最多的是字典的特点问题，好几次编写工作会议上都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1976年我和格非到北京出版局汇报工作，陈原同志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说单纯去讨论字典的特点，讨论和词典的分工，不容易得出什么结果来。最好是先研究字典该包括什么内容，如何编写。这话使我们茅塞顿开，回去以后，我结合编写组提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写了《关于〈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在楷书汉字上下工夫》等论文，都是阐明字典特性这个问题的。随着编写工作的深入这个问题也就统一了。

编写工作开始不久，对于什么是字典义项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因为接触到具体的字，特别是多义的时候，大家总不免要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发动编写组讨论了多次，由张清源教授写了《谈义项的建立与分合》，这篇文章在当时字典组内部颇有影响，我的《义

||

项琐谈》就是读了张清源文章后写的。

在字典编写完成的时候，我又听取了各编写组和编纂处一些工作人员的意见，写了《谈字典的修订工作》，那篇文章针对性非常明显。知道内情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有人说这篇文章谈到的问题都能够“对号入座”。我想真能够“对号入座”，对下一段工作有个交代，也算自己给自己办了“后事”。

这本论文集的第一部分选录有关《汉语大字典》编纂问题的文章都属于这方面的内容。

文集第二部分是有关辞书史的，有一部分写在编字典以前，如《从〈切韵·序〉论〈切韵〉》、《读〈广雅疏证〉》等，是当年在北京大学进修离校向导师高名凯教授辞行时他励我今后治《中国语言学史》而写的。这两篇文章先祖父都看过，并且作了修改。其余则是在编字典时候写的。虽说这些论文是为《中国语言学史》备课而写，但是在编字典，所以这些文章中自然地写进了一些辞书学的内容。

第三部分是两篇有关音韵学的，是读书笔记，也是为字典审音收集材料写的。带有资料性质，以为两篇文章都不好找，所以把它们收录进来。

第四部分三篇文章多少带有一点纪念意义，它们是我上个世纪50年代在当时几个语文刊物《中国语文》、《语文知识》、《语文学习》上面发表的文章。用的都是笔名。其中发表在《语文学习》上的那一篇，被收入《现代汉语》课的教学参考资料。发表在《中国语文》的那一篇是突击学习了俄语后作的一个习作，时间已经过去了50年，现在我学的俄语多年不用已经快还给老师了。

文集编完，总觉得有些话要说，文章里面有些话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当时却使我们为它大伤脑筋。费了不少的

时间和精力,才初步弄出一个究竟。从这些文章也可以看出一个参加辞书编纂工作的人所经历的道路。如果读者读了这本书,能够对辞书发生兴趣并因此下工夫去探讨它,参加到辞书编纂的实践中来,我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本书有不妥当甚至错误的地方,恳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们能够给我以批评和教正。

赵振铎记

2005年10月10日于四川大学之东风楼

目 录

关于《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	1
论我国字典编写的传统	8
在楷书汉字上下功夫	22
大型字典收列复音词刍议	30
审音述闻	39
义项琐谈	49
字典杂议	70
潜心壹志 乐在其中	78
谈字典的修订工作	82
论字典	90
字典情缘	102
《尔雅》	118
扬雄《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	136
刘熙《释名》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	148
《广雅》散论	153
郭璞《尔雅注》简论	175
读《经典释文》札记	193
从《切韵·序》论《切韵》	208

《广韵》的又读字	231
关于《集韵》的校理	258
读《广雅疏证》	265
《经籍纂诂》和辞书编写	282
先秦两汉人名异文的音韵学分析	289
唐人笔记里面的地方读音	325
同行语(语言学名词选译)	354
关于方言词的问题	356
关于汉语外来词的几个问题	362
后记	370

关于《汉语大字典》的 编写工作

一

《汉语大字典》是一部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主要任务的大型语文工具书。

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里,用为数不多的字母记录语言,它的一个单字就是语言里的一个词,字典和词典没有区别。在我们国家,记录汉语的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方块汉字,每一个单字表示一个音节。而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复音词占绝对优势,一个方块汉字不一定就是一个词,它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词素。这就决定了字典和词典的区别,字典不就是词典。语言里的词是语音和意义的结合体,词典的重点在注音和释义。方块汉字包括形音义三个方面,字典除了注音释义外,还有解形的任务。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方块汉字的存在,决定了汉语字典的存在。今后汉字改革了,实行拼音文字,还有人要研究用方块汉字记录的文献,汉语字典仍然需要。

汉语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文献。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到今天的楷书,已经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科学文化进步,书写工具的改进,汉字经

历了不同的阶段。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到今天的楷书，字形有了不小的变化，字数有了很大的增加；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字音也在演变；方块汉字表示的意义更是纷纭复杂。因此，编写出一部反映汉字形音义各方面现状和发展变化的《汉语大字典》，不仅有重大的科学价值，而且有很大的实践意义，它将对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起重要的作用。

根据《周礼》的记载，公卿大夫的子弟八岁入小学，学“六艺”，其中第五个项目就是“六书”。这里虽然讲的是统治阶级的事，但是读书首先要识字，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秦汉时期的各种识字课本，如《仓颉篇》、《博学篇》、《爰历篇》、《凡将篇》、《急就篇》等的出现，就是适应了这种需要。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算是我国最早的字典。随后陆续出现的有晋吕忱的《字林》（已亡）、梁顾野王的《玉篇》（原本已残）、宋司马光的《类篇》、明梅膺祚的《字汇》；到了清朝出现了《康熙字典》，这是把语文工具书叫作字典的开始。本世纪初又出现了《中华大字典》。可以这样说，编写字典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1975年教育部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在广州召开了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确定要编写一批中外语文词典，敬爱的周总理批准了这个规划。规划决定要编写的汉语词典有三十多部。《汉语大字典》的编写任务就是这次座谈会上提出来的。

《汉语大字典》要反映汉字形音义各方面的现状和变化，就这一点说，它和专门解释现代词语的《现代汉语词典》、专门解释古代词语的《辞源》、综合性词典《辞海》以及解释古今词语的《汉语大词典》都有区别。在这五部较大的辞书中，只有《汉语大字典》是以字

作为收录研究的对象，其余几部都是收录研究词的。这也就确定了它在辞书领域里占有特殊的地位。

二

《汉语大字典》是一部新编的字典。它跟旧字典有不同之处，它跟现在新编的和修订的词典也应该有所不同，有自己应该着力的地方。从编写的实践看，《汉语大字典》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首先是收字。汉字在使用过程中字数不断增加。《说文》收小篆 9353 个，《字林》收字 12824 个，《玉篇》收字 22824 个^①，《广韵》收字 25164 个^②，《类篇》收字 31319 个，《字汇》收字 33179 个，《康熙字典》实际收字 49174 个^③，《中华大字典》收字 46867 个^④，日本诸桥辙次主编的《大汉和辞典》收字 48885 个，台湾省出的《中文大辞典》基本上抄袭《大汉和辞典》，它收字也没有超过 5 万。《汉语大字典》估计收楷书单字 6 万左右，比上面提到的任何一部字典收字都多，它是当前收录楷书单字最多的字典。

其次是异体字的整理。汉字发展到今天，形成了复杂的汉字体系，它有不少异体字。解放以来，遵照毛主席有关汉字改革的指示，进行了汉字简化工作，包括精简笔画和字数。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确定了一批正体字，废除了一些异体字。但是这种简化目的在于方便当前的运用，它只涉及一些常用字，并没有触及汉字的整个复杂体系。编写《汉语大字典》必需对这些复杂的异体现象进行整理，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根据初步分析，《康熙字典》的异体字约有 2 千组，涉及 2 万

多字，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如果将大字典所收的 6 万个字拿来研究，发现的问题将会比现在已掌握的多得多。这项工作是编写工作中的一个较难的课题。

关于字形解说，对《汉语大字典》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要在楷书单字条目下收列能够反映汉字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并且要简要地说明它的结构和演变。字形解说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不并入有关义项的释文中。

在字音方面，《汉语大字典》要求对几万个汉字注出现代普通话的读音，并根据可能反映出中古和上古的字音情况。中古音的标注以《广韵》、《集韵》为主要依据。上古音只标注韵部，以近人归纳的三十一部为主要依据。近代出现的字，不标注中古音和上古音；中古出现的字，不标注上古音。

释义是字典编写最重要的部分。《汉语大字典》收列单字的义项应该尽量完备一些。一个单字本身就是一个词，它的所有义项都应该收列；有些方块字在现代汉语里并不单纯记录一个词，而是表示一个词素，或者某个意义只出现于词素中，这种词素意义也应该收进字典作为单字的义项。

字的通假意义是一种文字上的借用，不属于词的意义体系。对一部词典来说，可以不管或少管这种通假现象。但是，对于一部字典来说，应该多多收集字的通假用法。《大汉和辞典》比较重视通假现象，不过它使用了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关于通假的系统，把通假的范围扩大了许多，使人感到不易掌握。《汉语大字典》处理通假义注意语音和意义的关系，凡是语音上有关联而又有不少用例的，才算通假。

三

编写《汉语大字典》本身就是一项群众性的、集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可以这样说，科学的研究工作是字典编写工作很重要的一环，科研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字典的速度和质量。几年来的编写实践，虽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编写工作的内在规律有了一些认识。但是，经验仍然有限，编写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还不少。比方，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收字、注音、解形、释义和举例这个总的原则如何具体化？如何正确地反映汉字（特别是其中的多音多义字）形、音、义的历史发展及其辩证统一？如何处理历史地反映字音的演变与现代汉语语音规范化两者的关系？“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原则在释义和举例中如何体现？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都必需认真研究，作出科学的解答。

至于编写方案规定的每一个方面，都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研究。以收字而论，《汉语大字典》固然是楷书汉字的大汇编，它不是见了楷书汉字就收，因为有些字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收进字典只会增加字典的篇幅。要使《汉语大字典》收字尽量完备，又不失于芜杂凌乱，必须制定科学的收字原则。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石刻、碑、志、造象和写本上的字，宋元刻本里的新造字和俗字，明清白话小说、地方志里的新字和方言字，现代出版物中的方言字、科技字和新字，它们哪些可以收进字典，哪些可以不收？为什么这些字应该进入字典而那些字又不该进入字典？都应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问题讲清楚。

再以注音而论，根据统计，现在用汉语拼音字母注了普通话读

音的字没有超过 15000，就是这 15000 字中有些注音还有争议。如果《汉语大字典》收 6 万个单字，至少有 45000 多字有注音的问题。此外，同一字在《切韵》系韵书中有音韵地位不同的反切，如何收列？方言字的注音是否可以突破普通话具有的音节？这些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

在释义方面：如何建立义项？怎样算是一个义项，怎样又不算是一个义项？旧字典的义项不少是从古书注释中抄来的，其中有不少可以凭信，可以作为建立义项的依据，但是确也有不少随文释义、望文生义的地方。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说，从语言的社会性出发，探索建立义项的原则。

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不仅对于字典编写、审稿、定稿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将进一步促进汉语和汉字的研究。

四

王力先生三十几年前在《新训诂学》一文中把训诂学分为注释派、纂辑派和发明派^⑤。《汉语大字典》虽然是一部新编的字典，但是它的编写仍然是一种纂辑派的工作。在编写过程中，一方面要吸收古今已有的词典编写的经验证，另一方面还应该大量地吸收前人研究语言文字的成果。

旧字典在吸收前人成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汇集了不少有用的材料，我们要根据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原则，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为我所用。但旧字典并不能反映当时的语言文字研究成果，以《中华大字典》而论，它是本世纪初的出版物，对于清代乾嘉时代语言文字研究成果，虽然也吸收了一些，但

是还有许多该吸收的没有吸收进来。我们编写新的《汉语大字典》，应该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上多下功夫，狠下功夫。

编写字典是纂辑派的工作，并不是不可以有所发明。旧字典的义项，先秦的多一些，两汉以后的就收录得少了，魏晋唐宋就显得更少，元明清的几乎没有。这跟我国传统的语文学建立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对经书和先秦古籍研究得多一些有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编字典，就不能让这样的重古轻今的情况再继续下去，必须注意收罗两汉以后各个时代字义特殊用法的材料，丰富和充实字典的内容。

[附注]

- ① 参看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文字编》。
- ② 这个数字是四川大学中文系赵少咸教授统计的。
- ③ 据《汉语大字典》收字组同志统计，《康熙字典》实际字头为 46128 个，加上不作字头的字共 49174 个。
- ④ 这是《汉语大字典》四川省第一编写组资料组统计的。
- ⑤ 载《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载《辞书研究》第一辑 1979 年)

论我国字典编写的传统

—

字典编写的传统指的是在千百年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适合于汉语字典编写的方式和方法,它在长期的字典编写实践中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它是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字典编写有悠久的历史。《史籀篇》、《仓颉篇》等著作属于童蒙识字课本,不能够算作字典。现存最早的字典应该从东汉时期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算起。

《说文》在词典学上属于详解词典一类。它的出现是由于日益增长的解读本族语言文字的需要。国外词典学界不少人认为详解词典产生于公元 17 世纪,这是就西欧的一些情况说的。如果把东方一些民族词书编写的情况考虑进去,详解词典产生的时代会大大提前。就我国的情况而论,应该提前到公元 1 世纪。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有这样一段话: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渝。

这段话把《说文》这部字典的作用、编写方式、收字、释义、举例的原则都讲清楚了。在世界词典史上像这样明确地提出词典编写原则